

后殖民时期非洲沿海国家的首都区位逻辑 ——基于马达加斯加案例的对比分析

熊星翰

导言

自2019年初当选马达加斯加总统起，拉乔利纳 (A. Rajoelina) 开始推动一项名为“塔那太阳城” (Tana-Masoandro) 的首都卫星城扩建项目，计划在首都塔那那利佛市西侧的空地上兴建一个占地1000公顷的综合性新城。在规划中，该城市建成后将包括新的市政府、参议院大楼、总理府、使馆区和各类文化、教育、民生建筑及设施，由六车道高速公路与塔那那利佛旧城相连。¹ 该计划是拉乔利纳发展纲要中极具规模和野心的一个。它的规划投资额达到了25750亿阿里亚里 (约合8.6亿美元)，旨在把塔那那利佛打造成一个现代化、多功能的综合型城市。²

虽然这个城市的扩建方案目前进展甚微，依然停留在3D概念视频展示的阶段，但它反映出的马达加斯加领导人对自己国家下一步整体发展的设想却是真实的。“塔那太阳城”计划体现了拉乔利纳依然希望以塔那那利佛这个地处内陆的首都为中心，继续统领非洲最大岛国的发展。面对这样一种存在显著海陆对立的选择，本文将以此项马达加斯加独立以来最大的城市发展工程为切入点，对比后殖民时期至今三个向内陆迁都的非洲沿海国家与马达加斯加的首都区位逻辑，从而在宏观层面上，为非洲的“去殖民和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提供一个经济地理视角的思考。

一、三个向内陆迁都的非洲沿海国家

空间迁移是首都的一个重要特性，因为它尤其能体现在变动的历史条件下一个政治单元 (通常是国家) 如何重新规划自身的整体发展，而且迁都行为的发生必然涉及人类对于地理空间的理解和主动利用，是一种典型的人地互动演化现象。世界历史上的迁都行为不可胜数，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个国家版图趋于稳定的情况下依然发生了数量可观的首都迁移。值得一提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是迁都行为发生最频繁的地区。

为了增强和马达加斯加的可对比性，本文将着重考察的是三个非洲沿海国家 (尼日利亚、科特迪瓦和坦桑尼亚) 的迁都行为。这样进行对比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的迁都在轨迹上体现出从沿海向内陆转移的特点 (见表一)，因此探寻它们的迁都动因可以为理解马达加斯加首都在内陆延续的区位逻辑提供一个有意义的对照。

表一 1950年以来向内陆迁都的沿海国家

国家	迁都轨迹
缅甸	仰光—内比都
巴西	里约热内卢—巴西利亚
巴基斯坦	卡拉奇—伊斯兰堡
坦桑尼亚	达累斯萨拉姆—多多马

续表

国家	迁都轨迹
尼日利亚	拉各斯—阿布贾
科特迪瓦	阿比让—亚穆苏克罗

表格来源：作者自制

(一) 尼日利亚

作为当前非洲最大的城市，拉各斯在奴隶贸易时期就是西非最重要的贩奴港口，后来它又受到英国殖民统治者的偏爱，进一步巩固了自身地位。殖民结束后，采用联邦制的尼日利亚继续将拉各斯作为联邦首都，一直到1991年才正式将联邦政府所在地迁往阿布贾。³

尼日利亚迁都阿布贾是由两方面主要原因促成的。一是拉各斯城市化的速度过快，城市居民数量从1960年独立时的76万猛增到了1990年的476万。⁴为缓解拉各斯的社会和环境压力，寻求新的发展空间成为必要举措。二是尼日利亚国内的族群和宗教情况。拉各斯位于约鲁巴人所在区域，联邦首都长期停留在此引起了其它群体的不满，他们担忧拉各斯这样一个发展最好的城市会逐渐变成约鲁巴人的属地。⁵此外，由于尼日利亚北部属于伊斯兰教地区而南部沿海属于基督教地区，双方在首都位置上也在寻求妥协。出于这种多族群和多宗教的复杂内政情况，尼日利亚为新首都选址的时候希望能找到一个与各个主要势力都存在交集的核心区域，最终各方经过多次磋商，选定了阿布贾作为新的首都。⁶

(二) 科特迪瓦

科特迪瓦自1983年起正式将内陆城市雅穆苏克罗定为新首都，取代了沿海的阿比让。在科特迪瓦的迁都决定中，时任总统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 (Félix Houphouët-Boigny) 的个人意志体现非常鲜明。在1950年法国殖民末期的时候，雅穆苏克罗还是一个只有500人的小村庄，⁷但因为这里是博瓦尼的出生地，所以被赋予了特殊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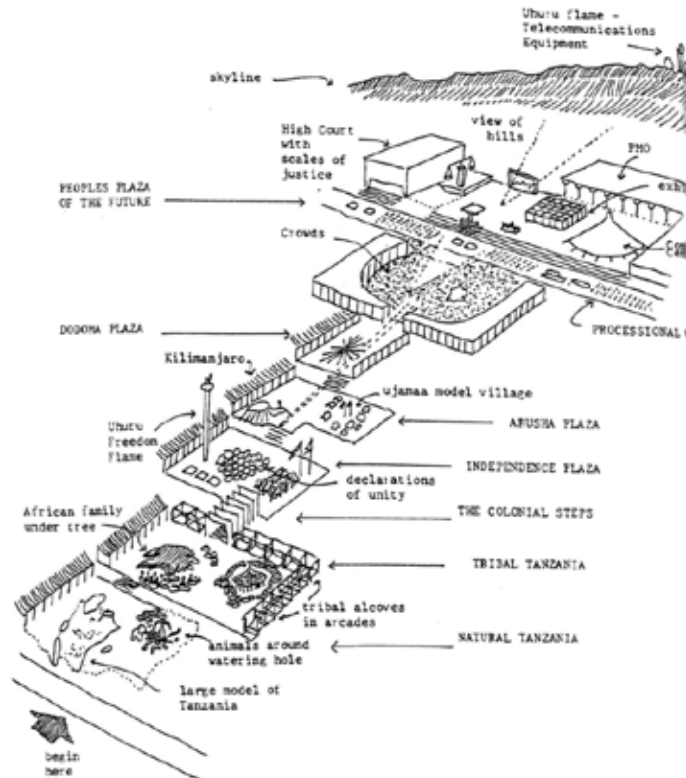
当然，尽管迁都这样的决定可能受到个人意志极大的影响，但是还需要其它方面的表述来增强其合法性。就此，科特迪瓦前总统洛朗·巴博 (Laurent Gbagbo) 的一篇文章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巴博认为迁都的最重要原因是与殖民时代进行切割，法国殖民时期科特迪瓦的首府就曾经进行过两次迁移，它们代表的是殖民者开发利用科特迪瓦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如何通过阿比让港口以及深入腹地的铁路掠夺科特迪瓦资源的经济逻辑。独立后的科特迪瓦需要通过迁往新的首都来展现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一种新的自我，同时寻求对自己伟大文化和文明的认同。此外巴博也指出，迁都雅穆苏克罗可以缓解阿比让的城市化压力，同时因为雅穆苏克罗更接近国土地理中心，可以更好地平衡各区域关系，特别是北方穆斯林和南方基督徒的关系。⁸由此可见，科特迪瓦的迁都举措是一项由个人意志主导的、但是又串联起当时整个民族国家构建和治理需求的过程。

(三) 坦桑尼亚

1974年公投后，坦桑尼亚政府正式决定将首都从达累斯萨拉姆迁往多多马。同尼日利亚、科特迪瓦相同，坦桑尼亚的迁都动机中，与殖民历史割裂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在坦桑尼亚的建国者们看来，达累斯萨拉姆代表着早先阿拉伯王朝和后来大英帝国的统治，而巴加莫约则象征德国的殖民，新兴的坦桑尼亚需要一个新的首都获得全新的自我认同与发展，⁹并且他们认为殖民统治的特点造成了殖民城市中惊人的贫富差距，通过建设新首都能够改善这一状况。¹⁰

与此同时，作为乌贾马 (Ujamaa) 运动的发起人，国父朱利叶斯·尼雷尔 (Julius Kambarage Nyerere) 要将乌贾马的理念融入到多多马的建设中来。为此，多多马的核心区域最初被设计成梯田状，配套的住宅区域也有一些被设计成村舍的格致，以此来彰显多多马作为乌贾马社会主义村庄化运动核心的地位。¹¹并且，梯田状最高处的核心区域还被赋予了坦桑尼亚人民攀爬历史高峰的政治隐喻 (见图一)，以此来赞扬独立后坦桑尼亚达到的新高度。

图一 作为梯田和历史进步隐喻的多多马核心区域



图片来源: Luce Beekmans (2018)¹²

虽然多多马的建设没有直接体现对于平衡不同宗教和族群利益的考量,但由于它所承载的乌贾马精神本身是一项追求社会、经济和政治平等的事业,所以多多马从设计蓝图的一刻起也就携带有追求社会公平的政治诉求。这一点在对多多马的地理位置选址上也透露出来。多多马位于坦桑尼亚内陆的核心地区,离各个主要族群的距离都大致相当并且处在道路交汇点上,按照尼雷尔的设想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坦桑尼亚人民。

综上,独立后将首都迁往内陆的非洲沿海国家在决策逻辑上体现出如下共同点:

都希望切割殖民历史并选择新的发展规划;都在政治上考虑兼顾不同族群和宗教的利益,并因此在新首都位置上选择接近国土地理中心的地方;都体现出政治领袖的个人意愿;新首都的建设都带有强烈的政治和文化象征意义;迁都皆未能改变原有沿海首都在国内经济层面的主导地位。

由此可见,非洲独立后的首都迁徙首先是政治因素驱动的,它们首要寻求建立新的政治、文化权力中心,而不是经济活动中心。¹³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从后续的发展情况看,以上三个非洲沿海国家进行迁都后,新内陆首都的发展并未实现原有设想,甚至加重了财政负担,激化了族群、宗教矛盾。

二、后殖民时期马达加斯加首都区位延续的原因

相比其它非洲沿海国家,马达加斯加的首都持续位于内陆,是什么原因使得塔那那利佛的核心位置如此稳固呢?笔者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人口分布与政治地理的共同作用。塔那那利佛地区近二百多年以来都是马达加斯加岛人类活动的中心,拥有全岛最稠密的人口分布。这不但在该地形成了马达加斯加最大的国内市场,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最充沛的劳动力。当然,人口密度自身并非避免迁都的决定性因素,非洲其它沿海国家向内陆迁都时就是从人口密集的地区迁往人口稀疏的地区。马达加斯加人口分布对于迁都的影响需要结合人口与人文地理的互动演化关系看待:马达加斯加中央高原人口密度绝对优势的确立是在前殖民时期的伊默里纳王朝时期完成的,也就是说,相比大多数非洲沿海地区在殖民者到来后才产生急剧的城市化进程和人

口增长，马达加斯加中央高原的人口增长源于前殖民时期本土王朝崛起的推动。这样的历史遗产保证了殖民统治结束后的当地政府延续使用塔那那利佛作为首都时具有历史叙事的合法性，可以将独立后的建都选择描绘为“恢复”马达加斯加历史上曾经的主权，¹⁴而不是必须在荒野上兴建一座新城来实现与殖民时代的切割。

换言之，马达加斯加历史上演化形成的人口地理分布与该国的殖民过往之间是可以调和的。在这个大前提下，上世纪末开始成为马达加斯加政治运行基本规则的民主制度，进一步与当地人口地理分布形成一个动态的正反馈机制——以塔那那利佛为代表的内陆地区的人口越密集，他们在全国范围投票中所占据的权重就越大，政治家在发展政策上就会向这一地区倾斜，而如此一来又会吸引更多的居民前来，从此周而复始，形成一个城市规模和民主诉求间相互增益的过程。

二是地形与建筑共同营造的景观特性。从前殖民到殖民时期再到后殖民时期，塔那那利佛都在城市景观的文化象征意义上扮演无可替代的角色。这其中首先起作用的是塔那那利佛的地形：十来座山丘在种满水稻的广阔平地上陡然凸起，俯瞰整个塔那那利佛地区，伊默里纳女王在其中最高的山丘上修筑了女王宫，使其成为马达加斯加最具有代表性的地标建筑物。¹⁵不仅如此，由于女王宫旁还有先王的寝殿、王族墓地以及一座天主教礼拜堂，它们和女王宫都象征着神性，又正好在天际线上体现着世间与天界的联结，所以对于马达加斯加民众又持续施加着宗教和精神层面的作用。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马达加斯加神性地理建筑景观的出现是与伊默里纳王朝崛起一脉相承的，在殖民时代也未被破坏，是当地漫长政治权力演化中浸入到国民内心和文化肌理中的景观。在这一点上，塔那那利佛的城市景观和雅穆苏克罗圣母堂、阿布贾国会大楼以及多多马的巨型乌贾马村都不相同，后者是后殖民时期构建民族国家时拔地而起的新坐标，之所以能实现这样的工程往往依赖于国家领导人的个人设想和意志，缺少历史中沉淀的群体政治文化认同。

三是族群与种姓的空间分布，需要高度差来维持意义。由于最初创建伊默里纳王朝的梅里纳人从一开始已经占据了塔那那利佛的山丘和高地，所以后来当岛内其它地区的居民前来时，大多数只能选择低地居住，这强化了梅里纳人（特别是精英梅里纳人）与其它族群的等级差异。此外，在中央高原还存在一种类似种姓制度的社会阶序结构，处于最顶端的是梅里纳贵族 (Adriana)，其次是梅里纳人的自由民 (Hova)，这两个阶层占据了塔那那利佛城市内的高处空间。在他们下方的有曾经服务于梅里纳王庭的佣人 (Mainty) 以及社会地位最底层的“奴隶” (Andevo)，后两者主要生活在塔那那利佛的低地。长此以往，在马达加斯加社会的心理空间和语言表达上，内陆独特地理环境中的空间高低反差成为了划定社会等级和维系国家秩序的重要依据。

社会等级在塔那那利佛地区的空间表达还被作为模板复制到了马达加斯加其它地区，比如南部城市菲亚纳兰楚被梅里纳人征服以后，后者于当地选择一座山丘并在其顶部修建了和塔那那利佛相似的王宫和住宅区，使得王朝都城的权力空间表达在遥远的领地也能够被复制和感知。

四是宗教事务。除了16至17世纪在沿海小规模传教活动以外，基督教在马达加斯加真正大规模的传播是从塔那那利佛开始的。19世纪初，希望与欧洲国家增强联系的拉达玛一世 (Radama I) 邀请伦敦传道会 (LMS) 前往塔那那利佛，并且就在山顶的王族社区内建立教堂和学校，向伊默里纳的王族家庭讲授语文、算数以及其它基本课程，当然同时也允许他们开展传教活动。有了当地最高权力的背书，基督教迅速在马达加斯加中央高原传播开来，同时塔那那利佛自然而然成为全国基督教的中心。¹⁶除了伦敦传道会所属的新教，天主教在法国殖民马达加斯加后也迅速与新教展开竞争，并最终取得了和新教分庭抗礼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天主教也将传教的核心定在了以塔那那利佛为代表的中央高原地区，至今为止，塔那那利佛总教区依然是马达加斯加信徒最多、规模最大的天主教区，教皇方济各2019年访问塔那那利佛时举行的弥撒吸引了75万人前来观看。

此外，由于马达加斯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无法向广大国民提供足量的公共服务，这其中的很多空缺需要宗教力量填补，而由于人口分布原因，马达加斯加宗教机构提供公共援助和服务最多的地区还是塔那那利佛。这就使得塔那那利佛成为一个以宗教为媒介，融合政治、外交、资本等诸多要素互动的场域，物质和象征、国内与国际层面都不断增加这个城市在马达加斯加的权重，使得它作为首都的地位更加牢固。

综上，塔那那利佛在政治、文化象征以及社会层面都占据不可撼动的主导性地位，并且它是一个在漫长人文地理演化中形成的中心城市，无论在政治还是文化层面都可以得到自我历史叙事和文化资本的支持。并且从深层逻辑上看，马达加斯加首都区位的延续和独立后三个向内陆迁都的非洲沿海国家具有高度一致性——政治、文化因素的考量在此间具有先于经济因

素的权重。

因此，当前马达加斯加政府耗费巨资发展内陆首都的卫星城符合该国的人文地理传统，并且能获得本国经济地理演化逻辑的支撑。但如同迁都内陆的非洲国家没能够获得新首都的理想发展一样，马达加斯加持续内陆统御沿海的发展逻辑也会经受相似的地理困境考验，比如国家的内陆化和交通成本的提升。

结语

与“塔那太阳城”计划遥相呼应，拉乔利纳在马达加斯加最大港口城市塔马塔夫推动了另一个城建工程——“迈阿密项目”(Project Miami)。不过尽管后者的命名同样宏大，但在实际内容上却相形见绌。目前完工的一期工程仅仅包括一条500米左右沿海道路的翻新，以及差不多同样长度的海滩景观改造(新建一块篮球场、一个滑板池、一个花园和一个观景露台)。毫无疑问，这种力度的改造很难达成拉乔利纳为其赋予的“提振马达加斯加旅游业”的使命。¹⁷此外，与景观上的小修小补相比，反倒是塔马塔夫年标准集装箱的吞吐量远落后于东南非洲其它国家海港的事实更让人印象深刻。

迄今为止，对“太阳城”计划的评论往往集中在它是否能够成功实现，但是却忽略了它宏观的选址逻辑——这个具有风向标意义的城市发展项目依然立足于内陆首都。对于拥有非洲最长海岸线并且是世界第四大岛屿的马达加斯加来说，这种整体布局很可能进一步延缓其本已十分滞后的沿海发展，加重其独特的“内陆式岛国”窘境。

非洲沿海国家迁都内陆和马达加斯加首都区位在内陆延续的过程中，体现的都是人文地理格局在复杂性历史演化中凸显的“海—陆”张力。一方面，近现代非洲沿海城市的率先崛起并不能简化成一个殖民者短时间的决策后果，相反，这是海洋时代中，资本主义扩张下一个长时段的经济地理演化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结构性态势，西方殖民者的选择更多是基于全球化物质、资本大流动的空间特点而做出的。从功能主义视角而言，这当然是为了“统治和掠夺”的便利性，但这样的简单判断太强化殖民者的主观选择，忽视了经济地理演化中由于人地之间的长期交互作用才会形成特定区位布局形态的特点。只有重视这一特点，才能在迁都内陆的决策制定中更加谨慎。

然而另一方面，尽管将首都置于内陆的抉择有待商榷，但它同样存在自己的历史和社会特殊性。无论是去殖民时建构统一民族国家的需要，还是后来民主制度下地理空间的选票化，都在推动首都区位抉择远离殖民时代野蛮的功能性思维——一切为掠夺和经济服务。种种权衡与掣肘下，甚至于何处优先发展都逐渐成为无解的难题。

1979年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从此带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的腾飞。马达加斯加上一任总统在介绍自己国家的发展远景时，曾声称要打造马达加斯加的深圳。希望这个美丽的岛屿能早日得偿所愿，探索出自己的路径。

熊星翰，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国家和区域为马达加斯加和南印度洋地区。

- 1 Tanà-Masoandro, The new city of Antananarivo, (August 22, 20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xzM1pm9ZHM>.
- 2 Projet Tanà Masoandro, Un investissement de 2575 milliards Ariary, (August 23, 2020), <http://www.midi-madagasikara.mg/economie/2019/07/31/projet-tana-masoandro-un-investissement-de-2575-milliards-ariary/>.
- 3 Toyin Falola and Matthew M. Heaton, A History of Niger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ugust 2008.
- 4 Demographics, (July 9, 2020),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agos#History>.
- 5 Simon Bekker and Göran Therborn, opp. cit., p.88.
- 6 Jonathan Moore,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Nigeria's New Capital,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ume 22, Issue 01, 1984, p.172.
- 7 Robert J. Mundt ed.,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Cote d'Ivoire, Second Edition, the Scarecrow Press, 1995, p.177.
- 8 Laurent Gbagbo, Pourquoi Yamoussoukro? (September 2, 2020), <https://www.jeuneafrique.com/129487/archives-thematique/pourquoi-yamous-soukro/#:~:text=Abidjan%20est%20donc%20une%20ville,culture%20et%20de%20notre%20civilisation.>
- 9 Emily Callaci, Chief village in a nation of villages': history, race and authority in Tanzania's Dodoma plan, Urban History, 4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112-113.

- 10 Ibid., p.96.
- 11 Andrew Friedman, The Global Postcolonial Moment and the American New Town: India, Reston, Dodoma,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38(3), 2012, p.566.
- 12 Luce Beeckmans, The Architecture of Nation-building in Africa as a Development Aid Project: Designing the capital cities of Kinshasa (Congo) and Dodoma (Tanzania) in the post-independence years, *Progress in Planning*, No.122, 2018, p.21.
- 13 Simon Bekker and Göran Therborn, *opp. cit.*, p.193.
- 14 Larinihiko Denis Alexandre, Ecrire l'histoire du mouvement de résistance à la colonisation : un enjeu historiographique à Madagascar, *Afrika Zamani*, No. 17, 2009, p.271.
- 15 Catherine Fournet-Guérin, *Vivre à Tananarive: Géographie du Changement dans la Capitale Malgache*, Karthala, 2007, p.30.
- 16 Catherine Fournet-Guérin, *op. cit.*, p.44.
- 17 Présidence de la République, Toamasina : Le Président Andry Rajoelina amorce le projet « Miami », (September 3, 2021), <http://www.presidence.gov.mg/actualites/1084-toamasina-le-president-andry-rajoelina-amorce-le-projet-miami.html>.

《区域观察》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海淀区清华园1号 中国, 北京 100084 清华大学中央主楼 205 室 电话: +86-10-62787747 官方网站: http://iias.tsinghua.edu.cn/	协调人: 张静 本期执行编辑: 高良敏、郑楠 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霆懿、李宇晴、杨崇圣、何演、周燕、郑楠、 段九州、高良敏、傅聪聪
未经授权, 请勿转载, 引用请注明出处。	